

中共「整黨運動」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中國大陸組

一、討論主題：當前中共整黨運動之前因後果

二、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三、時間：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二

時半

四、地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二樓會議室

五、主席：張主任京育

六、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章陵先生：臺灣大學副教授

李天民先生：師範大學教授

李國雄先生：政治大學副教授

玄默先生：文化大學教授

芮和蒸先生：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徐炳德先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張念鎮先生：政治作戰學校教授

陳力生先生：「中國大陸」月刊發行人、成功大學副教授

陳森文先生：師範大學教授

陳濟民先生：成功大學教授

郭華倫先生：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曾永賢先生：臺灣大學副教授

裘孔淵先生：臺灣大學教授

趙先運先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趙洪慈先生：政治大學副教授

魯瑞麟先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二)本中心出席人員：

張京育先生 曹伯一先生 周煦先生 鄒雲亭先生

尹慶耀先生 畢英賢先生 蘇秀法女士 陳元先生

張鈞先生 魏艾先生 張鎮邦先生 汪學文先生

邢國強先生 葉伯棠先生 操穉青先生 方雪純先生

張競立先生 趙倩先生 吳安家先生 張虎先生

劉勝驥先生 廖淑馨女士 王玲玲女士 張欣南先生

周玉山先生 許光泰先生 陳永生先生 張雅君女士

熊自健先生 江振昌先生

七、主席報告：

很高興能夠請到中心以外的學者專家前來出席這次會議，相信這次會議會對我們很有幫助。中共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有共同之處，即權力來源非出自公意，不可能形成黨外民主。黨的上層權力來源亦非來自多數黨員，爲了權力爭奪，總是發生派系鬭爭，以清洗方式定於一尊。中共整黨不止一次，最早在民國卅一年就有延安整風。這次整黨運動，中共十二大會就作出決定，準備以三年的時間完成。這次整黨與過去一定有其差別。如，過去黨內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像今天那樣大的懷疑和否定；對百姓而言，共產主義在過去還是一種理論。但卅年來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倒行逆施，却使大陸老百姓產生了三信危機、共產主義渺茫論、社會主義異化論等各種各樣的反馬列毛思潮。今天中共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鞏固領導權的問題，它必須把任何敵對勢力加以清除或加以再教育。第二個問題是老百姓對共產主義沒有信仰的問題，以致各式各樣反馬列、非馬列、自由化思想在知識份子及廣大羣衆中滋長。第三個問題是黨本身的問題，即黨存在著嚴重的思想、組織和作風的不純，貪污、腐化、走後門的現象十分普遍。中共希望透過整黨運動來解決這三個問題。在作法上，中共說是希望以緩進方式進行，以免引起太大的抗拒。不過如果遇到阻力，如何避免擴大、加深黨內鬭爭，還是個問題。今天請各位學者、專家來到這裏，希望討論一下：(一)這次整黨和過去整黨在內容上和實質上有些相同相異之處；(二)整黨過程中，會面臨些什麼樣的問題，那一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大，那一方面的阻力大；(三)大陸同胞對整黨運動本身抱有種希望及看法；(四)整黨目的能否達成，使我們對中共政權的未來能有一更清楚的認識。現在先請四位擔任引言人的先生發表高見。

八、引言報告：

張鎮邦先生：

(一)當前中共整黨的背景

今(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關於整黨的決定」，決定從今冬開始，以三年的時間全面整黨，五年內求得黨風的根本好轉。這裏我打算就當前中共發動整黨的背景作一分析，並將這一次的整黨與歷次的整黨作一比較。對中共當前發動整黨的背景，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考察，即一方面從中共本身的需要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從鄧小平鞏固他已經取得的領導權加以考察。

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寫了「新階級」一書，指出蘇聯共產黨因爲壟斷了一切財富和權力，已經變成一個新階級，即特權階級。現在的中共也是如此。如果中共和蘇共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今天的中共，比之蘇共更腐化。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上的十幾個執政的共產黨中間，中共的腐化，居於第一位，這是可以拿這幾年中共自己所公佈的資料來說明的。惟其如此，所以中共的一名元老陳雲說：「黨風問題，是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問題。」而中共就是希望通過這一次整黨，使整個黨能去腐生新，脫胎換骨，把過去的革命傳統恢復過來。因此，我們把中共這一次整黨說成是一次「救黨運動」，絕不爲過。中共「關於

整黨的決定」特別提到這次整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是這個意思。

從鄧小平想要鞏固他已經取得的領導權考察，則中共這一次整黨想要達到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統一思想。今年七月一日中共發行了「鄧小平文選」，並立刻通令全黨加以學習，以便做好整黨的思想準備，便是具體的說明。其一是排除異己。關於「整黨的決定」強調必須清除「三種人」，即追隨林彪、「四人幫」「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這些人也就是今天存在在中共黨內的反鄧的人。

一般研究中共整黨的人，比較注意後兩點，而忽略了前一點。其實前一點比後兩點更重要。因為前一點做到了，對鄧小平來說，後兩點也就做到了。

(二) 這次整黨與歷次整黨的比較：

下面我再拿中共這次整黨與中共歷次整黨略加比較。

中共在竊據大陸以前和以後，曾經發動過多次整風、整黨。其中有幾次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有幾次只開了一個頭，便不了了之。因而個人認為，可以拿來和這次全面整黨作比較的只有三次，即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發動的整風；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後來演變成爲「反右派鬭爭」的整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已經超越了整黨的範圍。但它是一次先把黨砸爛再加以重建的行動，所以仍然可以和這一次整黨相比較。

前面說過，這一次中共的整黨，是一次「救黨」的行動，它對中共在客觀上是絕對必要的。否則中共對中國大陸的統治便將無法維持下去。但前面三次，都與「救黨」無關，因爲當時中共的腐化遠還沒有到達今天的程度。不過今天中共的整黨與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仍然有相似之處。這就是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想要達成的兩個目標——統一思想與排除異己，與鄧小平今天的目標完全相同。（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以「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並打擊了以王明爲首的國際派；後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也是企圖以「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並打倒反對他的黨內「走資派」。）

另外還有可以比較的一點，就是延安整風是反左；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開頭既不反左，也不反右，後來才演變成反右；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所以也是反右。而這次的整黨則既反左，又反右。這話怎樣說呢？中共「關於整黨的決定」強調清除「三種人」，這三種人就是追隨林彪、「四人幫」的極左份子。但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又決定「清除精神貪污」。爲此鄧小平說在思想上戰線上必須以反右爲主，亦即以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爲主，這不是既反左又反右嗎？這種在組織上反左，在思想上反右的情況，在中共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後，大陸出現了信仰危機。鄧小平在反左以後現在又轉過來反右。這反映了鄧的左右搖擺，也說明了今天存在在中共內部的思想問題的嚴重性，這個問題絕不是一部「鄧小平文選」所能解決的。

另外，我想還可以提出幾點，用以觀察今後中共整黨的具體發展：

1. 過去中共三次整黨整風都採取了「殘酷鬭爭，無情打擊」的做法。這次中共「關於整黨的決定」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但同時又提醒大家不要走過場。究竟這次中共整黨會不會重複過去的錯誤還是走過場，值得我們注意。

2. 過去中共搞運動，常常給打擊對象訂出一個指標，即百分之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鬭爭」即其一例。但這樣的做法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什麼不是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五呢？這次中共整黨，決定不訂指標，意思是實事求是，有一個，清一個。但文化大革命時期入黨的有一千八百萬人，其中「三種人」不在少數。這樣，中共通過這次整黨開除的黨員將超過百分之五，即四千萬黨員中的二百萬人，很有可能。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3. 中共在一九五七年發動的「反右派鬭爭」，搞了五十五萬個右派份子，其中大部份是黨外人士，一部份是中共黨員。所以中共這次整黨，首先聲明不把黨外人士包括在內，以安黨外人士之心。但中共的政策是易變的，它能否堅持這個方針到底，是一個問題。

4. 中共「關於整黨的決定」提出這次不搞「羣衆整黨」，可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搞的羣衆整黨的教訓太深刻了。但中共能否做到這一點，也是一個問題。

陳濟民先生：中共整黨的對象

在此一專門性座談會上擔任引言報告，事實上我只能表示一點個人的看法，不能對問題有何綜合引述或說明。在本項主題中，本人想對中共此次整黨的對象作一簡略分析：

(一) 中共當前處境，從外表上看，似乎形勢大好；但實際上，則是形勢大壞；而大壞的形勢，是因大好形勢所引發。中共國際關係日見熱絡擴大，而民主自由思想對大陸人民的啓迪，亦日見深遠，對馬列思想的排斥，更爲激烈。外表的活躍，加深了內在的思想危機，整黨要與所謂消除精神污染、提倡精神文明相結合，可以看出思想層次的鬭爭，超過其他因素。

(二) 中共明確指明整黨的對象，有所謂「文革」造反起家，幫派分子，打、砸、搶分子三種人。其實這些所指的對象，早被中共列爲清除的目標，並無什麼新奇之處。事實上這些整肅對象的認定，應以是否受到西方精神污染爲前提。換言之，即是否還堅定信仰共產主義，是否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已失去信心。因此，它的整肅目標，不是個別的，而是整體的，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在此狀況下，方便了權力鬭爭，幫派傾軋，使得人人自危，對中共的向心力更爲崩解。

(三) 中共過去多次整黨，是某一得勢幫派，對另一失勢幫派的整肅，是在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共同信念下的爭奪權力、爭奪路線的鬭爭行爲，可以運用組織、特務、武力來達成願望。因爲是黨內的鬭爭，通常還可以控制。此次則不然，是黨內對主義前途失望的整肅，如果大家認爲共產黨體制前途渺茫、精神分裂、意志動搖，則不是用組織、特務、武力所能控制得了的。而執行者必陽奉陰違，甚至作爲整肅的力量，反而成爲破壞的力量。抱薪救火，後患無窮。

四 鄧小平在有生之年，在其多次起落之後，應知共產主義及其制度，已走上死路。他更知想由共黨內部改革來挽救偽政權、收拾人心，是不可能的，目前還是延用毛澤東在美、俄兩大之間利用矛盾投機求生存的老藥方。這一藥方，可以止暫時之疼痛，却遺下病入膏肓之後果。這一絕症，就是人心大變，人人要自由，時間愈久，接觸外界愈多，中共就愈發無可救藥。他左右兩難，又開放、又收縮，正是這一絕症斷氣前應有的現象。

陳力生先生：中共當前整黨之擴張

中共的整黨運動擴展到清除精神污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二中全会通過的「關於整黨的決定」，在整黨的四個任務之一的「統一思想」中，談到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左和右的錯誤傾向，提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沒有談到精神污染和社會主義異化的問題。二中全会公報透露：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還提出了加強思想戰線工作的問題，全會決定中央於今冬明春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並作出相應的決定。但是，十月二十四日，王震的講話，却透露鄧小平在二中全会嚴肅地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問題，並且首次批判了社會主義異化論。從此，中共中央展開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熱火朝天，形成一個新的反右鬭爭。這顯然是中共黨內鬭爭一個新的戰役，越出了二中全会關於整黨的部署。現在有些省委召開會議，決定把學習文件做為當前的中心工作，這是原來預定的整黨步驟。但又討論了清除精神污染問題，還說清除精神污染，是思想整頓的重要內容，是整黨的重要任務。有的還強調精神污染的嚴重性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迫切性。這種做法，已改變了整黨運動的步驟，在中共黨內一定有一番鬭爭，這是應該探討的事情。下面我想提出個人的三點看法：

(一) 所謂精神污染到底指的什麼？十月卅一日，中共文化部長朱穆之在出席工會「十大」的文化工作者代表座談會上說：目前全黨要整風，在思想工作部門要着重解決精神污染問題，特別是在理論部門、文藝部門更為重要。精神污染大體有兩大類：一是背離馬列主義，抽象的宣傳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社會主義異化等；二是宣傳淫穢、色情、兇殺恐怖、荒誕離奇的東西和吃喝玩樂腐朽糜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兩者危害性都很大，但後者比較容易識別，而宣傳人的價值、人道主義、異化等，却不容易被人識破。許多同志沒有清醒的足夠的認識，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認為這是思想活躍的表現。沒有看到這是在宣傳資產階級和其它剝削階級的反動腐朽的思想，散佈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情緒。它是關係到造就什麼樣的一代人，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十一月一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羣會見「美聯社」北平分社社長的談話，指出精神污染可分四類：第一類是屬於淫穢、野蠻、反動的東西。第二類是藝術表演中一些低級的東西。第三類是追求個人享受、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的東西。第四類是違背社會制度的言論。比較起來，朱穆之的兩分法比鄧力羣的四類污染要好。依朱穆之的分法，一類是非政府性的，有些東西確是精神污染，那也是人類社會所無法澈底清除的，在什麼社會都是難免的。就這方面說，社會主義社會算是污染少，比較乾淨的。一類是政治性的，如宣傳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這不是什麼精神污染，

而是信仰危機，它是社會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社會主義異化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異化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存在，跟資產階級實在扯不上關係。但是，它關係到共黨的黨和國家的命運，所以，是思想整頓的主要目標。

(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矛頭首先指向文藝界，這已不是一般的整黨，而是一次從黨內擴大到黨外的文藝整風。「文聯」主席周揚被迫作了自我批評，但他檢討的重點在異化論和人道主義。十一月十日，「文聯」舉行座談會，周揚主持，說：「文藝界存在的精神污染問題，已經不是很短的時間了。嚴重的問題在我們有關領導機關的軟弱渙散，沒有很好的組織力量來抵制和清除它，也沒有通過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是周揚的自我批評，承認領導不力。

到底文藝界有什麼精神污染呢？據十月卅一日「新華社」評論員「向精神污染作鬥爭」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說：「有些文藝作品，把人性、人道主義抽象化，歪曲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些作品散布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懷疑；有些作品宣傳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有些作品宣揚悲觀厭世的頹廢情緒，引導人們到宗教裏去找精神寄託；有些作品黃色下流，公然違反社會的基本道德。至於文藝評論和理論文章，有人主張文藝要背向現實，離現實越遠越好，離政治越遠越好。有人宣稱：只有抽象的人性才是發展創作的動力；也有人大講『社會主義異化』問題，把他們認為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當作文藝創作的主题；還有人對西方『現代派』推崇備至，否定或貶低『五四』以來，特別是三十年代和延安文藝座談以來，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傳統。凡此種種，都是給人們思想上造成混亂，污染人們的心靈」。從上面這段話，我們大致可以了解中共對文藝界精神污染的批評重點。然而，在這三百字的罪狀中，只有「黃色下流」四個字是精神污染，其它都是表現情感、思想、人性的，也可以說是反馬列主義的精神污染的。這就變成政治問題，不是藝術問題了。

中共從三十年代起就重視文藝，以文藝為奪取政權的工具之一。延安文藝座談集中推出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文藝路線。但是在建立政權之後，主客易位，共黨當權派與文藝界由統戰關係，而變成內部矛盾，再變為敵我矛盾。馬列主義毛澤東路線成了文藝界的枷鎖，此所以有不斷的文藝整風。在文藝路線上，主要的問題是中共講現實主義。在延安時期，它挑動作家大寫現實，暴露現實的黑暗面，但在取得政權之後，倘再如此實行現實主義，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傷痕文學所以曇花一現，近年來鄧派要求文藝作品歌頌「四化」，這就成了「歌德派」，是江青所說的「革命浪漫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了。延安文藝座談強調為工農兵服務，現在鄧派改為「為人民服務」，但是，人民公僕已異化為人民主人，所以社會主義異化現象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题，這是當前文藝整風的主要目標，像過去的文藝整風一樣，又是文藝界的一次浩劫。

(三)當前在思想戰線上的反社會主義異化論，包括思想、理論、文藝各方面的。異化論本來是馬克思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但是，大陸的知識分子却用以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創造了社會主義異化論，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動搖了共產政權的基礎，證明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空想，所以中共把它看成是影響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是洪水猛獸。因為社會主

義社會所存在的思想上的異化、政治上的異化、經濟上的異化，比資本主義社會嚴重得多。共黨把共產主義社會分成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先是共產主義渺茫論粉碎了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幻想，現在社會主義異化論又宣布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的醜惡。這個社會主義道路還能堅持下去嗎？所以社會主義異化論成爲這次整頓思想的首要目標。

馬克思的異化論出於他自己意料的對共產世界已經造成傷害。馬克思的異化論本來是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但是我們這裏在研究馬克思異化論方面有個趨向，就是偏重介紹，而很少分析批判，尤其對社會主義異化論很少分析、運用。個人有個建議，我們今後應多研究社會主義異化論，把馬克思的武器，作爲反馬克思的武器。

裴孔淵先生：當前整黨之趨勢及其影響

在就提綱第七項發言之之前，謹先申述對「整黨」範圍的理解。廣義的現階段中共「整黨」應視爲共有三個環節，一是中共「整黨決定」中的「整黨」，對象爲全體黨員，以「三種人」爲主要目標；二是「嚴懲刑事犯罪活動」，對象爲「紅旗」雜誌所指的「七類分子」（註），主要是青年；三是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對象是理論界和文藝界的知識分子。三個環節都是實現「四化」的「四項重要保證」中的三項，爲中共「十二大」所提出。三者緊密連結，互爲影響。「整黨」在於偽裝中共有自我改造的決心和誠意，重振威信，以利於推行「嚴懲犯罪」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嚴懲犯罪」的屠殺在製造社會恐怖，間接爲整黨開路；「清污」則在配合「整黨」任務中的「统一思想」一項，並有助於扼阻社會「犯罪」風氣。研究當前中共整黨之趨勢及其影響，必須掌握以上的理解。

（一）當前「整黨」之趨勢

1. 關於第二次「文革」之可能性

中共這次「整黨」雖以清除「三種人」爲主要目標，但「三種人」現時缺乏領袖（「文革」派各級領導分子大多已下獄服刑），暫時並無爆發第二次「文革」之可能性。

不過，就以下幾點來看，仍有可能再度爆發「文革」式動亂可能：

（1）「文革」派勢力並未根絕，他們一直揚言：「十年以後，東山再起」，「要讓時間把那些老傢伙熬死」。

（2）屠殺運動開始後，大陸青年就流傳說：「『文革』是青年人整老年人，現在是老年人整青年人」，是「搞報復」，搞「秋後算帳」，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3）一如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強曉初所說：「『三種人』還在領導崗位上，有的繼續得到信任和重用，更爲嚴重的是目前還

註：「七類分子」指所謂舊剝削分子、反革命分子、敵特分子、刑事犯罪與壞分子、新剝削分子、林、江集團殘餘分子、唯恐天下不亂分子。

有人唯恐「四人幫」在我們黨內絕種，採取種種手段進行庇護。」

(4)「文革」以後入黨的新黨員為數過多，他們即使不作正面反抗，也會以假檢討來過關，無法清除淨盡。

2. 關於「影響『四化』建設之可能性」

中共雖說「整黨」、「懲罪」、「清污」三者都是「四化」的重要保證和重大步驟，但它們對「四化」積極的助益並不大，消極的不利影響則會很嚴重。自由受到限制，人民的热情和創造的活力都將消失。

由於中共已普遍加強對外商外人的監視和控制，禁止黨員、幹部、人民對外交往，這將使「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受到阻礙和打擊。

3. 關於打擊「民主黨派」之可能性

彭真曾對附庸黨派公開宣布過：「決不整民主人士」。所以，中共「整黨」不致於擴大波及附庸黨派。

事實上，附庸黨派在經過「反右」和「文革」兩次慘痛教訓之後，早已噤若寒蟬，並且百分之百地依賴中共的供養以苟延殘喘，除了作「歌德派」和應聲蟲之外，不敢也不能有所作為。

4. 關於批鬥知識分子之可能性

雖然據鄧力羣宣布，「清除精神污染」尚在「準備」階段，但批、鬥之風已經開始，不過是文鬥不是武鬥；是動筆動口，還沒有出現過去那種肉體迫害。但「雙百方針」則已經收起。

「清污」的打擊對象，目前還只限於理論界和文藝界，他們多是黨內知識分子和所謂「黨員作家」，未來可能擴大及於教育界、出版界、美術界、音樂、電影、戲劇界，以及農村中的各方面。

(二)當前「整黨」對中共及大陸各界之影響

1. 整黨、整風難收實際效果

鄧小平的主觀願望是要將中共重整為一個「職業革命家黨」。但中共早已是一個掌握統治權力的官僚特權專政集團，這一願望不可能達到。在中共黨內，很多人也對整黨前途缺乏足够的信心。

下述各點，將可為整黨的實效作出評估：

(1)色彩顯著的「三種人」，雖然絕大部份將被清除，但恐只限於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的。至於一般幹部要全部清除是很困難的。

(2)中共黨員、幹部的特權腐化風氣，暫時或會收斂一陣，思想言論上也可做到暫時的表面一致，但不可能澈底收效，這是中共這一統治集團的本質使然。反之，中共對黨員的過分壓抑，將會促使黨員更加離心離德，信念危機愈益嚴重。

(3) 鄧派今天對「整黨」，儘管小心翼翼，力求溫和寬大，不敢重蹈過去「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覆轍，但並不能保證不出亂子（鄧小平早就說過，會有人打黑槍、示威、鬧事、報復）。尤其共軍的態度和動向，值得重視。這一次王學成義士就是在「整黨」聲中駕機投奔自由的。

(4) 中共承認，會有人可能乘整黨機會，煽起派性，用派性整人。

所以，中共「整黨」，雖然說必須「層層排隊，人人過關」，但主要是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方式，容易過關，影響不大而難收實效。我們判斷，「整黨」將會以「走過場」結束。

2. 打擊及於社會全面

「嚴懲刑事犯罪活動」與「清除精神污染」打擊面極廣，有所謂「院院見血、口口有勞、位位有管」（每一偽法院都必須殺人；每一系統都必須有人被送勞改；每一單位都必須有人受管制）；打擊對象，有「七類分子」的青年，有理論界、文藝界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以一切反鄧、反中共制度勢力的全社會為對象，所以「全面整黨」成了「全民整風」，也就是全社會性的鎮壓。不過，今天上述的「七類分子」青年，都是出身於工人、農民、中共幹部、知識分子的家庭，在大陸淪陷以後出生成長的，知識分子也屬於新的一代，由中共培養而成並受它的控制。

如前所述，「嚴懲犯罪」僅能收效於一時，只要不滿共產暴政，嚮往自由的心理以及「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依然存在，中共制度無法澈底改革，則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就永不可能「根本好轉」，所謂「嚴懲犯罪」也必然要長期化了。

對理論界、文藝界的所謂「清除污染」，其影響則是極其惡劣的。這一措施無異是對大陸同胞的精神窒息和思想扼殺，久而久之，必將使大陸社會陷入黑暗的長夜。對中共自身而言，無異是中毒已深的吸毒者，缺乏決心和勇氣戒毒自拔，而要抗拒解毒的良藥，要排斥外來的新鮮空氣和陽光，繼續走向慢性自殺。

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動搖和分歧，來自理論本身先天的虛弱和謬誤；文藝界的「自由化」傾向也是由於中共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合理促成，都不能完全歸因於外來的影響。中共今天一切要想採取關閉扼殺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

3. 中共進退維谷難有出路

鄧小平一派篡權以來，其路線政策自初期的標榜「解放思想、發揚民主」開始，即陷入了不停的左右搖擺、進退失據的困境，目前則更走向經濟「放」、政治「收」，組織反左、思想反右，對黨員溫和、對人民殘暴的種種矛盾局面。

正像中共自己所說，「整黨」實際上是一場否定和保衛「四項基本原則」的大鬭爭，我們更要說，這是大陸社會「三信危機」的進一步深刻化，它關係到中共集團的生死命運。

也誠如陶希聖先生的名言：「鄧小平一派關起門來是死路一條，打開門來，則三民主義就進去了。」中共要想走出一條「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無可能；而我們「三民主義進軍大陸」則大有可為。

王章陵先生：

中共整黨，一般以延安「整風」為開端。其實在此之前，「馬日事變」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湖南省委，即已開始進行黨內整風，當時頒佈的「九、十兩月份組織工作計劃」，可以說是中共整黨最早的文獻。

中共整黨形成的因素有三：1. 黨內鬭爭；2. 思想危機；3. 黨魁的政治野心。現就中共整黨在文教思想方面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稍加說明：第一、中共整黨，總是先從思想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標榜「三不主義」，到今年上半年對文學問題的爭論，似乎還是堅持「雙百」方針。這一點，四月間鄧力羣在「馬克思主義與人」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可以證明。但從七月一日起，中共叫出「統一思想」的口號，却風向大變。到了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並決定思想戰線，以反「右」為主，揭開了整黨的序幕。這與當年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罷官」揭開「文革」序幕如出一轍。第二，當前整黨的火種來自軍中和「文革派」。這一事實可從兩方面表現出來：一為白樺事件。白樺本是鄧小平死黨。白樺的「苦戀」拍成電影，在內部放映時，各軍區司令員均表異議，最先批判白樺的就是「解放軍報」；一為趙易亞事件。由於趙在去年八月撰文強調精神文明有階級性，因觀點不合乎「鄧小平路線」而被迫自我檢討。趙為「解放軍報」顧問，此事導致了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的解職。其次就是「文革派」殘餘。我們可從鄧力羣和李德生的態度來研究。鄧力羣肯定對「人」的討論要執行「雙百」方針，不能隨便下政治結論，李德生認為「有右的東西當然要反」。兩個人的文章均發表在今年四月，但立場態度不同。我們均知李德生背景，他與「文革派」的淵源很深。第三，文化思想之爭，就是政策路線之爭。軍人在文化思想領域點火造反，其根本原因就是反對「鄧小平路線」。所謂「鄧小平路線」就是「四化」，就是允許個體經濟的恢復。軍人的優屬津貼減少或取消了，這就製造了新的反對派。鄧小平面對這一反抗勢力，目前只有「兩手抓」，就是一手搞「四化」，對外開放政策不變；一手反「精神污染」，整黨整風。但是反對派要爭取自己的利益，也只有「毛澤東思想」能替他們爭到。因此，當前整黨的根本問題是政策路線的問題，今後中共究竟要走那一條路線，在這三年整黨過程中，或許能看出一個頭緒；而其關鍵在於誰在整黨過程中奪得政策的決定權。

郭華倫先生：

(一) 中共整黨是非整不可，不整則垮。根源是羣衆唾棄中共。其中原因甚多，遠因一為「文革」期間，紅衛兵批鬥當權派，連中共中央負責人也受到批鬥，黨的組織和中共各級領導人成為羣衆唾罵打擊的對象。二為「文革」過程中，毛澤東提出「開門整黨」，要羣衆參加黨的會議，以羣衆意見來評定幹部及黨員的優劣，共產黨變成了羣衆的尾巴，黨員幹部要看羣衆眼色辦事，黨成為落後羣衆的工具，黨的威信掃地。因此，這次中共中央乃「決定」，不可再走「羣衆整黨」的道路。

(二)毛澤東在「七大」前整黨(即延安整頓三風)數年後，僥倖完成了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共此次整黨，鄧小平希望由此而能逐漸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以把「鄧小平文選」作為整黨學習的主要文獻。因此，我想中共今後還是會走個人崇拜的道路。不過鄧小平年近八十，也是希望以整黨來安排他的後事。目前共黨第一梯隊不退休的老幹部均屬高齡，起碼是七十歲，在黨政方面，他安排了胡耀邦、趙紫陽。但問題最大的還在軍隊。軍隊中有左的思想，對鄧的賤毛批毛表示不滿，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強迫離休更是反對，為了整黨，中共雖派了十萬人的「工作隊」下放部隊，能否順利整黨還是有大問題。人事方面雖安排了楊尚昆為軍委副主席，準備接替鄧小平的軍委主席，但他年齡亦不小。因此，整黨關鍵仍為軍隊問題，值得注意。

(三)至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二中全会公報曾提到鄧小平談過思想戰線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今冬或明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此一問題。但公報發出後，會議還沒有召開，却將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提前發表，並展開運動，而沒有按照整黨決定先進行學習、批評，再處理類似精神污染等等的思想問題，顯得步驟有一點亂，沒有按部就班去做。

(四)從歷次整黨來看，這次整黨恐不會不了了之，即所謂走過場。因為所謂學習文件，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準備與揭發事實的階段，到了審查階段，那是鬭爭的開始，接下去必然就是整肅。而且要審查的起碼有「文革」入黨的一千八百萬黨員，其鬭爭面的寬廣與複雜，可想而知，那又豈能在三年期間不了了之？

李天民先生：

我想以鄧小平升高個人崇拜為重點，談一談這次中共的整黨運動。

中共整黨決定規定必讀文件計有：「黨員必讀」、「毛澤東同志論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但特別強調學習「鄧小平文選」，實則鄧選是唯一重要文件。十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全面整黨的重要思想準備——論學習鄧小平文選」的文章，顯然一個新的個人崇拜正在升起。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時，中共中宣部當時發表的「整風文件」計有二十二篇，其中包括聯共文件、毛澤東講話六篇以及劉少奇、陳雲、康生講話各一篇。但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社重印的「整風文件」，則增至二十七篇，其中取消了康生的一篇，增加了劉少奇的「清算黨內孟什維克主義」和「論黨內鬭爭」二篇。這一簡明事實，一方面說明了劉康矛盾，為日後「文革」鬭爭埋下了小小的種子。另一方面亦看出毛澤東當時雖已在安排強化他個人的領導，但他還要拿一些人的講話來陪襯他，沒有搞「一言堂」。

鄧選出版後，它的突出遠在周選劉選之上。這次整風運動，又把它更突出。鄧小平如果再走個人崇拜的老路，毛澤東的今天，又何嘗不會是鄧小平的明天。

徐炳德先生：

最近我和駕駛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王學成談話，瞭解到一些中共軍中整黨的情況，現在報告出來供各位參考：

(一)由於中共喊出此次整黨的對象是清除三種人，即「『文革』造反起家份子、幫派思想嚴重份子，打砸搶份子」，而這三種人目前在共軍師級以下幹部中幾乎佔了百分之八十五，因此，現在中共軍中人言行都十分謹慎，以免被扣上帽子，造成軍中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二)現在中共軍中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傳說這次整黨的重點，是師級以下的幹部；二是軍中普遍流行一句「八十年代自顧自」的口頭禪。

魯瑞麟先生：

(一)當前整黨的趨勢

1. 搞第二次「文革」的可能性

中共宣傳部長鄧力群最近接見「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指出：「現在領導整黨的大部分幹部，過去都挨過整，是絕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顯示鄧派不擬發動「文革」式的整黨鬭爭。此乃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之時，具有無上權威，所以採取群眾整黨的方式，踢開黨委鬧革命。所以毛說：「天下大亂，情勢大好」。而鄧小平缺乏毛澤東畢生積累的權威，深恐由下而上發動「整黨」，造成天下大亂，一發不可收拾，破壞他近數年來處心積慮，曲意在國際間塑造的形象，因此乃採取由上而下的整黨方式，逐層控制，儘可能維持表面的秩序，避免重蹈「文革」的覆轍。但中共歷次整黨，皆由學習開始，而實為鬭爭整肅。整黨一經發動，勢難控制，是否會重蹈覆轍，誰也難於下一斷語。

2. 影響「四化」的可能性

共匪標榜整黨目的是爲了「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以保證「四化」的加速進行。所以「四化」是成功，端視整黨的結果。就此而言，鄧派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因爲如採取急風驟雨式的「整黨」，則將影響工作與生產，在實際上造成不利的影響；如採和風細雨式的整黨，略事批評、清理後即草草收場，則又無法達到統一思想、純潔組織的要求。而兩者皆不利於「四化」建設。

3. 打擊「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的可能性

中共強調爲了避免此次整黨產生偏差，出現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的錯誤，決定整黨「只解決共產黨內部問題，決不整民主黨派，不整黨外人士」。但鄧派在「整黨」之同時，又推動「清除精神污染」，前者以四千萬黨員爲對象，後者則把黨內、黨外知識分子都牽連在內。所以十一月七日「紐約時報」認爲是再度對知識分子加強思想箝制。近期周揚已被迫自我檢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已遭革職，顯示中共「反右」鬭爭已節節升高，未來發展頗堪注意。

(二)整黨對中共及各界的影響

對中共而言，「整黨試點」期間已出現許多問題，如有些地區已變質為權力傾軋，局部地區且出現「壞人整好人」，即反鄧派整鄧派的現象；有些地區則虛幌一槍，敷衍了事，即地方幫派互相妥協，共渡整黨大關，所以如何突破形形色色的干擾，把整黨順利推展下去，使其達到預期的效果，對中共及鄧派均有重大的影響。對一般黨員而言，他們對所謂思想、組織、作風嚴重不純等等，並無深切認識；對整黨能否解決問題，更「感到心裏沒底」，一般多漠不關心，認為「自己既非三種人，又沒有嚴重錯誤，整黨與己何干？」。對一般群眾而言，大多認為中共不正之風太嚴重，病入膏肓，沉疴難起。特別是官官相護，關係網變成防風林。儘管中共強調整黨不要走過場，但「一堵牆難頂四面風」，其結果還是要走過場的。這樣看來，中共這次整黨，便可能以不了了之收場了。

陳森文先生：

(一)目前中共黨內存在思想上、作風上、組織上的「嚴重不純」，以及所謂「精神污染」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實際上都是鄧小平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先後實行許多變革，纔迅速滋長和擴大的，也是「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機」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它的實質是反共和反鄧，同時也反映鄧派政策路線的失敗。

(二)這次中共的整黨，主要有幾個特點：1. 全面整黨；2. 長時間進行，三年分兩步走；3. 只整黨內，不整黨外；4. 不重複過去「群眾整黨」「非黨群眾決定黨內問題」的做法；5. 防止兩個偏向——走過場和殘酷鬭爭；6. 在方法上仍着重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7. 着重清除「三種人」；8. 雖然不先「定比例、定數字」，但仍然透露整肅對象在三百萬人左右。

(三)中共這次整黨，在宣佈「決定」後的十天內，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十月十二日，中共公佈「十二屆二中全會」的「公報」和「整黨的決定」，以及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整黨」的「社論」，都沒有提到「清除精神污染」這件事。「公報」中只提到：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了加強思想戰線工作的問題，全會決定中央於今冬明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並作出相應的決定」。到了十月廿三日，彭真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改變了說法，強調這次「二中全會」的「會議內容有兩項：一是決定全面整黨，一是準備清除精神污染」。隨後，中共還透露鄧小平在「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問題」，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的傾向」，並以此為依據，掀起了「反對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鬭爭」，又稱為「反污染鬭爭」。十月二十八日，中共「宣傳部長」鄧力群在回答「美聯社北平分社」社長提出的問題時，也特別強調「整黨」與「反污染」是「有密切聯繫的」，「因為整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統一思想，統一思想就要清除精神污染」。由於這一轉變，使中共當前的政治運動，又表現了幾個特點：1. 由「全面整黨」發展到同時也進行「反污染鬭爭」；2. 由「反左」、着重清除「三種人」，發展到同時也「反右」；3. 由整黨聲明「不整黨外」，發展到要求「黨外」也要參加「反污染鬭爭」；4. 目前「反污染鬭爭」反而超過了「整黨」，「整黨」還在「學習文件」階段，而「反污染鬭爭」已發展

到農村。

(四)目前中共在「反污染鬭爭」中，許多地區主要是採取以下手段進行：1.對這幾年來發表的文章、作品、上演的節目、講演、表演等等，都要普遍進行一次認真的檢查和清理，對清理出來的問題，區別情況，分別處理；2.整頓報紙刊物，對問題多的，要責令停刊整頓，未經批准備案的，應立即停止出版發行；3.對所謂「反動」和「黃色」書刊，圖畫、圖片、唱片、錄音錄像製品、曲藝和手抄本等等，都要進行嚴厲查禁，迅速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收繳；4.對一般性問題，採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解決，嚴重問題和犯罪人員則按照情節「依法懲處」。

(五)所謂「精神污染」，無論是在思想上、理論上、學術上、文學上、藝術上，以及生活方式上，其各種表現的實質，都是反共和反鄧的。十月三十日，中共發表的一篇「社論」中已經指出：「各種精神污染，不管表現形式如何，都是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制度根本對立的，它的實質是動搖四項基本原則，引導人們懷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上述鄧力群的談話，也承認造成「精神污染」的原因——內部原因是「舊社會的影響普遍存在，最近一個時間以來，有所發展」；外部原因是「這些年來，實行對外開放，的確出現了新的問題」，也就是「受外來影響」所發生的問題。按照中共慣用的說法和術語：一個是受到所謂「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一個是受到所謂「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主要的表現是突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人道主義」、「異化論」、和「現代派」思潮等等，其中中心點都在強調「民主、自由、人權」，揭露中共「假、惡、醜」的形象。也正如十一月五日中共「文聯主席」周揚在其「自我檢討」中所指出的：「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喪失信心」，「造成思想上理論上混亂」。所有這些，都是助長「三信危機」，也是「三信危機」在各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其實質都是反共和反鄧。

(六)最後，談到影響。中共這次「整黨」和「反污染鬭爭」，由於已經引起許多疑慮，造成「人心惶惶」，必將在許多方面產生嚴重的影響。首先，將使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以及「思想解放」和各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受到不斷的沖擊、干擾和阻難，從而妨礙其生產和各項工作，影響其留學生政策和留學生情緒；對其吸收外資、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經驗、以及改善對外關係、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等等，也將帶來不利的反應和困擾。同時，也將進一步破壞其內部團結，助長其政治和社會動亂，而重蹈以往「越整越亂」的覆轍。由於所有問題的暴露和發展，都在沖擊中共所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都是反共和反鄧，再加上這次運動中，鄧派既「反左」又「反右」，自陷「兩面作戰」，必然招致「左右夾攻」，「兩面夾擊」，這也就註定了它在這場鬭爭中，仍將徹底失敗的命運。

芮和蒸先生：

由於發言的時間無多，本人僅提出一個問題，就教於各位。

本人所提出的是有關思想的問題。政治發展必須靠思想來主導，不管那一種模式的政治，皆係如此。極權體系的政治，尤其強調思想要絕對統一；而民主體系的政治，也要樹立它的「共識」。然而任何一種的政治體系，皆有它若干的「政治迷思」(Political Myths)，例如民主政治時常談到的「全民意志」(General Will)，這是自盧梭倡言以來大家一直所熱切討論的，至於如何達成「全民意志」，這在政治學上迄今猶為不解之「謎」。但這並不要緊，它依然深切的鼓舞大家爲此一理想而邁進。又如我們的國歌「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如何進入「世界大同」的領域，這是我們一直執着追求的美麗的理想，而且深信必可達到這一天。

可是今天的中共，情勢大壞，它發生了嚴重的「三信危機」，它所有的「政治迷思」，完全解體。

由於它反覆的整肅、鬭爭，昨是而今非，或昨非而今是，同時批「左」，又同時批「右」，那又如何能維繫它的政治系統內的「政治迷思」呢？所以，它的最後發展，將會成爲絕望癌症，慢慢的死亡；也可能像火山爆發，迅速趨於解體。

李國雄先生：

中共此次的整黨運動，基本上可看作是「文革」後所必然也必須進行的一種政治作爲，以挽救「文革」十年所產生的許多社會及政治上的偏差，防止政權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個人覺得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角度來探討其整黨的背景：

第一，它反映出「文革」以後中共政權所出現的權威性危機。十年「文革」起源於毛澤東爲達成其奪權的目的，打着「造反有理」的口號，動員純真無知的青年學生，參加紅衛兵的行列，摧毀劉鄧一系列的黨政官僚結構。但是，當紅衛兵模式下的群眾運動演變成社會解體的暴亂行動時，毛却動用軍隊出面鎮壓，把紅衛兵一脚踢開，並通過下放運動，把大批爲他奪權拚命的紅衛兵下放到邊疆或鄉村地區。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年「文革」的後遺症，表現爲大陸上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對中共黨政權威的蔑視與挑戰。他們對中共政權打從內心喪失信心，不再視共產主義與共黨政權爲整個中國民族前途之所繫，紛紛要求從制度上作根本改革，認爲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則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只是空談。而另一方面，消極的年輕人則從事作好犯科，成爲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者。這顯示，清除這批「『文革』造反派」，是這次中共整黨的主要目標，以防止社會秩序的進一步解體和政權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第二，整黨的目的是要鞏固鄧胡趙體制的基礎，而以落實「鄧小平思想」到基層爲手段。「文革」結束後，革委會在軍隊支持下重新建立起黨的架構，但是整個黨的組織却不再是以前的面貌。在約四千萬的黨員中，幾乎有一半是「文革」期中入黨而分別佔領黨政中下層職位。這些人是「文革」的受益者，在鄧小平政權的四個現代化政策中，處於關鍵性的執行地位。鄧可以在上層清除「凡是派」及「四人幫」的餘黨，却無法把這一批「文革」中坐直昇飛機上來的人澈底清理。因而如何使這批「文革」時代入黨的黨員在心理上和政策執行上支持鄧小平政權，免除另一次「文革」奪權的動亂，也應該是此次整黨的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在政策上及黨內思想上出現了許多所謂「自由化」的傾向。鄧小平一伙一方面在經濟政策上強調利潤動機與物質的追求，認為追求利潤及物質上的滿足，並非自私；而進口外國科技和吸引外資亦不與自力更生的方針相違背。這些政策上的作為，牽涉到如何在進行現代化過程中使鄧的修正主義政策與毛思想取得協調。由於毛本人從一九三五到一九七六年間長期支配中共的黨政，其思想早已成爲中共全黨的指導思想以及政權合法化的基礎，因此鄧本人在非毛化之餘，絕不敢一如黑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那樣的向毛進行鞭屍；而鄧的政策却明顯地背離毛的路線。此等政策實際與理論基礎的矛盾，使鄧集團等於坐在一個定時炸彈上面。在這個意義上，整黨運動在於建立鄧小平思想的權威性，使其成爲馬列史毛一系列思想體系的當然延伸，完成鄧小平爲其接班人胡耀邦鋪路的工作。

玄 默先生：

在中共進行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批判社會主義異化論是一個重要課題。到目前爲止，宣揚異化論的中共理論家，已有老牌文藝總管周揚公開承認錯誤，「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辭職，支持異化論的「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被撤換；至於看風轉舵，由異化論者一變而爲反異化論者，如中共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貴思之流，更有人在。

「異化」(Entfremdung) 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術語，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分裂出它的對立面，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馬克思採用這種理論來表達關於勞動異化的概念。他認爲階級社會的工人創造了財富，而財富却爲資本家所佔有並使工人受其支配；因此，這種財富、財富的佔有以至勞動本身，都異化成爲統治工人的、與工人敵對的、異己的力量。異化的主要形式，就是私有制。只有消滅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對抗形式，代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消除這種異化現象。

但是，所有共黨政權國家，在廢除了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地主資本家階級以後，舊社會的異化現象不但沒有消除，反而趨於強烈。王若水在「新聞戰線」一九八〇年八月號發表「談談異化問題」一文，即指出中共的社會主義三種異化現象：(一)個人崇拜的「思想異化」；(二)公僕變老爺的政治異化；(三)社會主義建設越幹人民越窮的經濟異化。同年十一月間，西班牙共黨總書記聖地亞哥·卡里略在訪問中共時發表演講，指出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出現了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些現象當然也被認爲是社會主義異化的產物。

何以社會主義反而加劇加深了發生於階級社會的異化呢？中共宣揚異化論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歸因於左傾路線的錯誤、舊思想意識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初創的漏洞、人爲的錯失和列寧主義的缺憾等等消極因素，從而得到了克服異化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不過，中共同時也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需要進行創造性的理論發展，和現代自然科學相結合，以豐富它的內容，使它適應新的時代。「回到」是恢復，與「發展」不同。說明了中共的異化論者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找到一致的答案。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三十多年來始終保持原來的性質和形態，無論是思想上的個人崇拜、政治上的一黨永遠專政，還是經濟上的官富民貧，都是自始已然，一成不變，何曾有什麼異化問題存在？異化，必須是由「是」發展到「非」，由「正」演變為「反」；中共與世界上所有共黨專政國家的社會主義，從沒有一個出現過社會主義革除了舊社會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而實現了公平合理的理想，然後又從公平合理變成不公平不合理的歷程。所以，社會主義異化論是毫無根據的，是不能成立的。

中共的部分理論工作者公開談論社會主義異化，目的在於製造社會主義確有優越性尚未發揮出來的錯覺，欺騙人民再給它二、三十年的時間去搞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這從他們宣揚社會主義異化論而避免提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事實，就可以明白。可是，利用社會主義異化論為社會主義的錯誤和失敗辯解，只有極少數研究哲學的理論幹部了解它的意義，佔幹部隊伍中絕大多數的老粗官僚，如李先念、王震等，不但不了解，而且大為反對。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全靠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因而對社會主義向來堅持只許百般歌頌、不容絲毫指摘的態度。異化論之大事宣揚，開始於一九八〇年，到現在根本沒有產生蒙蔽人民羣衆、特別是知識青年的作用，也緩和不了「三信」危機；反而是反中共領導、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活動日見擴大。這就使得中共官僚有了反異化論的充分口實，鄧小平、胡耀邦也有批判異化論的必要。

中共批判所謂精神污染的異化論，對異化論者引為論據的思想、政治和經濟諸種馬克思認為只應存在於舊社會的異化現象的具體事實，說成全部是和社會主義制度無干的偶然發生的情況。但是，根據唯物辯證法，事物的必然性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現形式，始終服從於隱藏著的必然性。準此而論，舊社會的異化現象之繼續存在和加速發展之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之不能克服異化，實為正確的判斷。中共不承認這一點而批判異化論，將使思想紛歧和精神解體的危機進一步深刻化。

汪學文先生：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在一關於整黨的決定」中，特別提到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希望這次整黨能像當年整風一樣，達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延安整風是中共首次公開整風。在上海時期，中共是地下組織，在江西時期，中共三年受到國軍五次圍剿，都無法公開整風。延安是中共的割據地，已經不是地下組織，而且正在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乃公開地進行權力鬭爭和路線鬭爭。當時雖在抗戰時期，中共幹部就日漸腐化、相當腐化。例如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曾指出：不僅「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且「歌轉玉堂春，舞迴金蓮步」。但是，時代不同、實況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中共當前的整黨，却很難達到類似延安整風之目的與效果。

延安的整風，乃是整頓三風，即包括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當前的整風，中共雖然在文件上僅列為「整黨」，但是實際上已擴張到學風和文風。例如中共「中宣部」部長鄧力群於十月廿八日會見「美聯社北平分社」社長格雷厄姆時，曾公開指出：清

除精神污染問題與全面整黨是有密切聯繫的，因為整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統一思想，統一思想就要清除精神污染。

又如邢賁思於十一月五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異化問題和精神污染」一文中指出：精神污染在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大談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異化，並聯繫異化問題大談抽象的人道主義。大陸思想界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七八年以來見之於報刊的討論文章就有六〇〇多篇。

由上可見，精神污染、社會主義異化論，以及人道主義，目前已普遍地流傳到大陸上的理論界、文化界、教育界，以及文藝界。基於此，當前中共的整黨，勢必如同延安整風一樣，要擴張到學風和文風的整頓。

至於整頓的方式，目前乃是困擾中共的問題。

如果文關，則思想很難改造和統一。因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現象，正不斷地產生與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自由相敵對的東西，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是難以忍受的，而且社會主義異化論較共產主義渺茫論更具體、更現實，用文關是解決不了的。如果武關，則會產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鄧力群已表示不敢採用這種方式。

總之，由於文關和武關都是難以採用的方式，當前中共的整黨運動，勢難在三年內達到預期的整頓構想與整頓任務。

會永賢先生：

我想就整黨的趨勢，提出一些意見：

(一)從鄧小平一派的權力基礎看：他們雖然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但是在地方和軍隊中的左右兩股勢力仍然相當強大，儘管有不同的立場和主張，却對「三中全會」以後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加認同，甚至陽奉陰違，公開抗拒。剛才徐炳德先生介紹了王學成義士所說：在中共部隊的師級以下幹部中，應該清洗的「三種人」達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一段話，足以說明軍中問題的嚴重性。以此類推，在地委級以下的各級幹部中的「三種人」，亦必不相上下。他們決不會在整黨運動中束手就擒，坐以待斃，其抗拒的力量，勢必隨著整黨運動由上而下地展開而越來越頑強。

(二)從共產黨員的傳統作風看：這次整黨運動儘管偽裝「和風細雨」，並反對「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但是整黨運動進入批評和自我批評階段後，每一個黨員為著自保，勢必運用其「寧左勿右」、「先發制人」的傳統作風，互相檢舉，互相揭發。以往的延安整風，以及中共政權成立後的歷次整風，都是如此。這次整黨當不致例外，而勢必由「和風細雨」轉化為「狂風暴雨」。

(三)同延安整風相比：毛澤東在延安所發動的整風運動是把黨內的異己勢力，包括國際派、張國燾派和各地「土共」勢力清除出去後才展開的。自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毛澤東奪取中共中央的一部分領導權算起，到七屆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國共產黨改變為「毛澤東黨」所花時間為十年。鄧小平想要依樣畫葫蘆，企圖通過這次整黨運動奠定其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大一統局面，把中國共產黨改變為「鄧小平黨」。但是，鄧小平的

條件，遠不如毛澤東，黨內的反對勢力仍然強大，鄧小平還不能為所欲為。

目前要預測這次整黨運動的前途雖然為時尚早，但根據上述情況，可能出現下列趨勢：

第一、遭受頑強抗拒後，當權派不得不作出讓步而「走過場」了事。

第二、當權派如果不顧一切蠻幹到底，可能出「亂子」，或演變成為「第二次『文革』」。

第三、地方上的反鄧勢力聯合在一起，利用「舉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來對付鄧派勢力，有如劉鄧派在一九六三至六五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對付毛派勢力一樣，使鄧派清除異己的目標落空。

趙先選先生：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處理兩大問題，一個是「整黨」，通過了「整黨的決定」，規定整黨的基本任務、基本政策、基本方法；另一個是處理思想戰線上「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決定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鬭爭」。鄧小平、陳雲在會中講話強調：「整黨不能走過場」，「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反對精神污染就是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垃圾』。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殃民」。

所謂「整黨不能走過場」，它有兩個主要標認。第一是要看「三種人」和那些犯有嚴重錯誤及造成重大破壞的人是否受到組織處分，第二是要看黨員是否提高黨性、接受思想教育、端正黨風；所謂「不能搞精神污染」，就是要「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非但不能散佈自由的東西，還要與之作積極鬭爭」。

以上大致是中共推動「整黨」和「除污」兩件大事的說法。綜合觀察，可見「整黨」是它黨組織內部的整肅，而「除污」則勢必涉及到黨外知識份子。而所謂「整黨」只解決黨內問題，不涉及黨外，就不可能了。

「整黨」要清除的「三種人」，原屬「文革」鬭爭「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功臣，而今隨著中共內部翻覆，由功臣變成犯罪份子，鄧派痛打落水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資本主義精神污染」這股妖風由何而起？它與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政策」有何關連？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政策」，既如鄧派所宣傳的「正確」，又何以未能早加察覺，而竟讓它發展到足以「禍國殃民」的地步？

關於「整黨」的問題，論者已多，以下着重探討另外幾個問題：

(一) 探索這股風潮的起源，需回顧毛澤東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以來，中共內部奪權鬭爭的歷程。

華國鋒在毛死亡未及一月的時間內，於當年十月六日逮捕以毛妻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為著向全黨說明此項逮捕行動的必要性、緊迫性、合法性，以及清除「四人幫餘黨」，華國鋒發起「揭、批、查」運動。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七月突破華國鋒的壓制，翻身復出以後，乘勢運用，推波助瀾，把揭、批、查發展為批判「文革」，評論毛澤東，於是乃引起兩股風潮：

第一是天安門事件翻案後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風潮。當時大字報和地下刊物，風起雲湧，所謂「四、五運動」、「人民萬歲」、「思想解放」等口號，一時響遏雲霄。

第二是「傷痕」文學的出現。這些作品，揭發「文革」的黑暗，舒發「文革」被關的憤怒，為華、鄧揭批「四人幫」搖旗吶喊。

這兩股潮流互相激盪，澎湃奔騰，似乎突破了大陸的寒夜，迎來了北京的春天。所謂「北京之春」乃成為各方矚目的氣象。但這「北京之春」對鄧小平預示的不是「萬紫千紅」的喜悅，而是「河山變色」的憂慮。因此，到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會上對華奪權佔了上風以後，便立刻對大陸人權民主運動改腔換調。他以樹立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為名，鎮壓「大字報」風潮。憑著鄧的一句話，中共便刪除了當時的憲法所保證的「人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接著便對民運活動與民運領袖實行鎮壓。至於「傷痕」文學，則借著鄧小平打擊經濟犯罪、整頓特權作風為名，而發展成為「暴露」文學、「批判」文學。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為中共的「三大作風」之一，在傷痕文學↓暴露文學↓批判文學發展過程中，中共的理論家援引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論」來分析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把「個人崇拜」稱為「思想領域的異化」；把中共自稱為人民公僕轉而成為人民的主人稱為「政治領域的異化」，把中共搞經濟建設而幹了像「大躍進」一類的蠢事稱為經濟領域的異化。換言之，即把鄧派所批判的事物，統稱為「社會主義的異化」，以之稱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政策為「撥亂反正」，作為鄧在各條戰線調整改革的理論口實。這便是為什麼從一九七八年以來，能夠有六百多篇討論「異化」和「人道主義」的理論文章，不論作者寫文章的動機如何，都能夠發表於中共嚴格控制的報紙、雜誌的原因。

(二)從前列過程中可以肯定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所激烈批評，並發誓必須清除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污染」，最初主要是由鄧小平鼓動評毛、鬪華所引發，繼後則因鄧小平破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政策」障礙並為之鋪陳理論基礎所採措施而激揚昇高；它顯然是鄧小平路線政策的產物。

例如對於當前在大陸社會廣泛流傳的所謂黃色的、反動的書刊、錄音、錄像和手抄本小書等，這是鄧小平對外開放政策引進的「污染」。而鄧小平在中共詩壇上所要清除的「精神污染」，例如「朦朧詩」、「現代派」、「三個崛起論」等，雖是一種頗為奇特、複雜的現象。追本溯源，却是由鄧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所引起。至於所謂社會主義異化的出現，則更是「解放思想」所直接促成。

(三)按照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公報」的說法，關於加強思想戰線工作的問題，全會決定中央於今冬明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並作出相應的決定；可見中共原本打算先鋪開整黨，再逐步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但在「二中全會」後，王震、彭真率

先分別在「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提出鄧小平、陳雲在「二中全會」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講話，特別是王震不指名批評了周揚本（一九八三）年三月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的論文，指責他宣揚「異化」「人性」和「人道主義」。到本（廿）月五日，周揚便公開表態，承認錯誤。「清除精神污染」按預定日程排列在全面「整黨」的發動之後，而今「整黨」的學習階段還沒有全面展開，「清除精神污染」却已率先落到具體人物的頭上；程序顯然是顛倒了。雖然還沒有證據可以說王、彭干擾鄧的部署，但這種顛倒日程的作法，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却是值得注意的。

周揚在自我檢討中，承認他在那樣嚴肅的場合，發表那麼輕率的文章，不夠鄭重、謙虛；也承認他在同志們提出不同意見以後，仍然堅持己見，更爲不妥。但另一方面，周揚也檢討了他犯錯誤的原因，說是他近年「只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革也還茫然」，以致脫離了現實，發生錯誤，關鍵正在此處。周揚是因為沒有跟上鄧的步伐而犯錯誤。原來鄧自「十二大」和「六屆人大一次會議」以來，已經由奪權者變成當權者，由對往日現實的批判者變成對今日現實的辯護者。如果當前還有「社會主義異化」問題，則此「異化」的最大產物便是鄧小平，而周揚竟瞭然不覺，繼續說「異化」，既是不合時宜，更非鄧、胡所能容忍。周揚在其檢討中，很感慨地指出，要成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成爲一個激進的唯物主義者很不容易，要終身努力，終身奮鬥，此語實有無限辛酸。惟據中共透露，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此類文章發表共達六百多篇，其作者概屬中共黨內外高級知識份子；周揚既遭批評，其餘又將如何？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是否會再起矛盾變化？也是今後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問題。

爲著清除精神污染，鄧派在問題的提法上，說他們前此進行反傾向鬭爭，只顧反「左」，疏忽「反右」，致令一個傾向掩蓋了另一個傾向；因此，當前的重點是「反右」。以中共右派聞名的鄧小平而今居然提倡「反右」，可算是一項激烈的轉變。但是，鄧小平反「左」有「文選」，「反右」無理論，「指導思想」陷於混亂、真空，「毛澤東思想」因而止退回昇。「十二屆二中全會」以來，以紀念毛澤東九十誕辰爲名而召開的會議，已有軍事科學院理論工作者「在新形勢下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座談會」、「全國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第四次座談會」、「中國文聯毛澤東文藝思想學術討論會」。而今距毛澤東生日（十二、廿六）爲時尚早，近月內還可能有更多的紀念集會。毛澤東偶像回昇，勢必助長左派聲勢，而中共「整黨」又以肅清「左」派勢力爲重點。兩條戰線的鬭爭交織在一起，其矛盾、複雜的局面將如何發展？也是今後值得注意的又一問題。

鄧小平在思想理論戰線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鬭爭，這鬭爭本質上是在意識型態領域內進行的反西方運動。由於中共當前揭發的「精神污染」情況，關連到各條戰線、各個環節，此一思想上的反西方運動自然要普遍進行。但在實踐層面，趙紫陽將訪問美國；胡耀邦已定期訪日；而中共還在處心積慮爭取雷根赴大陸訪問；中共又積極同西方往來。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矛盾的情況，此後究竟是「理論」抑或是「實踐」主導發展的方向？它對中共內、外政策的影響又將如何？更是今後值得注意的另一問題。

（四）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於上（十）月十一、十二日召開，迄今時爲不過一個多月，它所決定的兩件大事，雖然剛開始推動，

但已顯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險惡形勢。它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事實，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鄧小平近五年來為解決中共舊問題不僅造成了許多新問題，而且新問題比舊問題更顯得複雜嚴重。此後「整黨」、「除污」如果是「走過場」，則後患將遺於胡、趙；如果是迫於形勢而陷入「殘酷鬭爭」，則立即便可能有大亂臨頭。鄧小平往何處去？中共往何處去？中共當前強調「整黨」的最大危險是走過場；清除精神污染的當務之急是反右傾；二者都帶有激烈鬭爭的趨向。鑒於三年後中共按黨章規定應該召開「十三大」，時間有限，而鄧、胡到時必須有所交待，情急事迫，鄧小平整黨想要避免激烈化，恐怕極為困難。

張念鎮先生：

整黨運動乃是中共進行所謂「黨的建設」的主要手段，正如剛才主席所提示，從民國卅一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首次的「整風運動」，建立了毛澤東一元領導以後，每隔幾年，中共就要發動一次整風運動，對那些所謂「不正之風」與反黨現象進行整頓。到現在為止，中共已經先後進行了十多次大小規模的整風運動，前一個運動剛剛結束，後一個運動又在發動之中。特別是自民國卅八年中共政權成立以後，由於長期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致其黨員幹部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階級，因而也就產生了當前中共自承的「共黨主義渺茫論」、「社會主義異化論」、「八大不正之風」、「十個問題」與「三不純」等黨內危機。中共為期消除此一危機，特於一九七九年初成立「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各級地方黨委的「紀委會」，藉以強化黨的紀律。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五中全會」又復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企圖通過此種清規戒律，扭轉歪風。但是結果呢？黨風敗壞的現象不僅未能稍斂，反而變本加厲，更趨嚴重。尤其是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以後，給中國大陸帶來了民主、自由和人權等現代思潮，當一般民衆瞭解了歐美各國、日本和我復興基地繁榮進步的實況，更加加深其對社會主義的厭惡，遂使中共原已嚴重敗壞的黨風，更趨惡化、深化。所以中共這一次的整黨運動就是在過去所採一連串的挽救措施未曾收效的情況下所採進一步的「救亡運動」。

根據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整黨的決定」，中共準備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進行一次全面的整頓，並希望在今後五年之內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共為這次整黨所訂的任務，即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但拿什麼東西來達成這四項任務呢？主要是以「鄧小平文選」為基本武器。十月九日中共「新華社」以「全面整黨的重要思想準備——學習鄧小平文選」為題發出廣播，目的就是要以學習「鄧選」為中心將「鄧思想」標準化，然後再以這個標準去衡量所有的黨員幹部，合乎標準的即合格通過，准予登記；不太合乎標準的，就勸告他們改過自新，以觀後效；完成不合標準的則請他們自動退黨或開除黨籍。

本次整黨的方式，中共強調既「不走過門」，也不主張「殘酷鬭爭」，從表面上看，鄧胡是要走折衷的溫和路線，其實不然。中共一貫都是好鬭成性，鬭爭愈烈愈好。毛澤東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鬭爭的哲學」，認為沒有鬭爭就沒有了一切，鄧小平追

隨毛澤東幾十年，當然他也最爲瞭解鬭爭的功能與作用。但是由於「十年文革」的慘痛教訓，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偽裝溫和。不過，我們可以預斷：中共如採取溫和手段，則雷大雨小，很可能不了了之，難收預期效果；我們從中共最近全面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反社會主義異化論」的過程中，濫捕濫殺的情況加以批判，即可看出鄧小平確已大動肝火，決心大整特整。據「美聯社」十月十七日北平電的報導，僅自今年八月以來，大陸各地被捕人數已達七十萬至八十萬人，被集體處決者亦逾數千。在此捕殺行爲中，除恢復了「文革」時的羣衆公審和集體處決外，行刑之前還要遊街示衆。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旦中共全面整黨開始，一場更大的腥風血雨又將瀰漫著整個中國大陸。由此可以瞭解當前中共的整黨運動實際上就是另一次「文革」的先聲。清除精神污染旨在維護馬列主義，打擊民主自由思想，建立鄧胡一派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其結果必然加大、加深大陸同胞的痛苦。因此，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大陸情勢的發展，並針對中共整黨的陰謀活動，隨時隨地予以揭發和打擊。

操縱靑先生：

中共歷次發生黨內事件，必須依靠軍隊的力量支援。如果回顧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前者毛澤東曾於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全力整頓掌握和發展軍隊的力量。後者毛澤東更依靠林彪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政治建軍，使軍隊成爲「三忠於」（忠於毛澤東、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工具。目前的鄧小平，兩次復出都兼任總參謀長，現在更兼任兩個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從一九八〇年開始，憑藉他所掌握的軍權，數次大量調整軍隊幹部，例如十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只有瀋陽李德生是一九七三年由毛澤東任命的，其餘十個，都是近三、四年新任的。二十八個省級軍區（包括特別市衛戍區）司令員也是如此。至於軍隊團級以上的幹部，從一九八〇年起，平均每年約有一萬五千至二萬人調動和離休。以上這些，都說明鄧小平對軍隊的控制，已經下了很大的工夫。故目前鄧小平發動全面整黨，所憑藉的力量還是軍隊。至於軍隊內部，鄧小平當然知道問題是嚴重的，他不能不嚴加防範。最近徐向前、李先念、楊得志都曾分別赴廣州、福州和南京軍區巡視，其任務即與軍隊整黨有關，以免因整黨而發生變故。因此可以判斷，在這次大整頓期間，特別是目前，軍隊不可能被攪得太亂。

張競立先生：

在中共的集權統治下，大陸社會長期以來就充滿著思想性、政治性、經濟性的種種矛盾，形成循環不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而以「治安不靖」、「經濟犯罪」和「政治反抗」三者最爲突出。這些問題，又每隨中共「權力鬭爭」和「路線鬭爭」的昇沉而有所起伏。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爲首的新當權派由奪權而掌權，對路線、方針、政策有所更張，緊接著就發生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一九七九年最突出的是知識青年爭民主、爭自由和爭人權的民主運動。一九八〇年最突出的是「刑事犯罪」案件與人數急劇增加，殺人、搶劫、盜竊、強姦、放火、爆炸，以及貪污、行騙、走私販私、投機詐騙、

逃漏稅收等各類刑事案件層出不窮。此種情勢，危及中共政權的根本。因此，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加強「專政」的手段，打擊「政治反抗」和「刑事犯罪」。一九八一年大陸社會治安問題日趨嚴重，迫使中共推出其兩手策略：一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開展「五講、四美」活動，企圖轉移社會風氣；二是召開「五大城市治安會議」，作出「紀要」，決定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採行：「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加強勞改、勞教措施，以及全黨動手發動羣衆進行『綜合治理』」，全面展開「打擊刑事犯罪份子」的活動。推行結果：「精神文明」無法立竿見影，「五講、四美」愈講愈醜，由「三信危機」發展昇高到「共產主義渺茫論」普遍流行。同時，「刑事犯罪」不特未曾稍戢，而「經濟犯罪」案件又特別突出，迫使中共於去（一九八二）年三月起，又展開了「打擊經濟犯罪」的活動，並訂出了「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以及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這兩個文件，前者是修改「刑法」條文，着重嚴刑峻法，後者則是闡述「經濟犯罪」與「經濟政策」以及與「整黨」的關係。去年一月起，中共一方面開展「雙打」（刑事犯罪、經濟犯罪）、「一建」（精神文明）；一方面積極整建「專政機關」，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旨在加強公安部門的力量，擴建武裝警察與籌設新型的「安全機構」，以防制「政治反抗」勢力，打擊「刑事犯罪」。本（一九八三）年四月正式成立「武裝警察部隊總部」，七月一日新設立了「國家安全部」，並在各省、市、自治區成立了「安全廳（局）」，全面加强了对大陸社會面的控制。接著中共於七月底八月初再度開展社會鎮壓，並於九月二日由「國家主席」李先念頒布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的程序的決定」。這兩個文件的主旨，仍然在於「重懲、速辦」，以為大開殺戒的法律依據。當前，大陸社會正在雷厲風行的展開鎮壓活動，集體處決人犯時有所聞，更多的是秘密處決，以及交付勞改、勞教、押往邊疆地區所謂「不容易犯罪的地方」管制勞動。

大陸社會動亂，「犯罪活動」與「政治反抗」愈趨愈烈，中共雖已展開了一連串的防制措施，但迄未根本好轉。其中關鍵性的問題，在於這些「犯罪」人數，除了一部份是大陸人民羣衆外，更多是屬於中共的黨員、黨員幹部和領導幹部以及其親屬份子的問題。因而在中共推行打擊活動中，面臨了三大阻力：一是中共的黨風不正，作為領導核心的一些「黨委」官僚主義、腐化惡化、辦事不力；二是中共的政法幹部，執法不正不嚴，對犯罪份子打擊不力、不及時，甚至該打擊的不予打擊，反而與其相互勾結，執法犯法。三是中共的某些高級幹部，運用「特權」包庇其犯罪子弟和親屬，膽大妄為、無法無天，使相對荏弱的執法部門無可奈何。中共的整黨，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動的。它想用社會鎮壓為整黨開路，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它所能收到的效果是值得懷疑的。

結論：

一、以動態的觀點研究政治文化的成長與變遷，對政治發展的瞭解有甚大助益。政治文化的內涵之一，是人民對政治權威的

性質所持的看法及對之信任的程度，研析人民對權威所持的態度，自然有助於預測一個政權的穩定性。故政治性的權威結構與社會一般權威關係，在性質上必須互相符合，政權纔能有效而且穩定，否則必然產生許多緊張壓力。

以此觀點來觀察當前中共「整黨運動」，顯然已觸摸到了中國大陸一般政治信念的深處。

二、中共在十月十一日的「關於整黨的決定」中已經清晰指出，當前必須大規模開展整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嚴重的背景與需求：

有些黨員對撥亂反正的意義缺乏認識，沒有站到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立場上來；

有些黨員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優越性，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認識模糊，思想混亂；

有些黨員對違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熟視無睹，有的甚至公然傳播這些思想；

有些黨員和幹部個人主義嚴重，甚至惡性膨脹，為謀求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走上犯罪的道路；

有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甚至處於癱瘓狀態。

以上這些出於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充分說明情況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這次「整黨」具有雙重任務：「組織反左，思想反右」。要求「統一思想」，「端正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中共歷史上的整黨、整風，大體上以單一任務為主，這一次則匯集反左、反右於一役，一方面任務自然艱巨，一方面也可以想見其處境的艱困。在「觀念層次」、「政治層次」以及「行政層次」，都顯露出病態。

四、陳雲一再以「黨的生死存亡」說明此次整黨的嚴肅性，似乎存亡在此一舉。若以「延安整風」與此次整黨作比擬，顯然其間存在着差距，但也有其共同之處。

延安整風由毛澤東主動，旨在建立個人神化地位，以打擊留俄派為着手處，所謂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等等，大抵皆環繞毛之權力中心運作。這一次整黨，以建立鄧小平為中心的目標，與延安整風頗相契合。但「信仰危機」、「幹部作風」、「組織功能」等諸般病態，以及因此所形成的「生死存亡」嚴重處境，則與延安時期並不相同。

五、一個社會內之諸般政治觀念、感情和態度，並非偶發的或是雜亂無章的。相反地它們能彼此交織而形成某種一定型態，並且相互激盪具有加強作用。經驗性的信仰、價值的認定，以及表意符號之間，皆有其密切關聯。

對於中共整黨，各位具有長期研究經驗的先生們，已分別從不同觀點予以剖析，使讀者對中共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所以，今天的盛會是有意義的。謝謝各位。